

从记者到“新闻官”： 国民党新闻管理者的职业抉择和职业悲剧 ——以董显光、曾虚白、马星野为中心的探讨

王明亮 秦汉

摘要

本研究着眼于阐释以董显光、曾虚白、马星野等为代表的原新闻从业者，在国难日深、民族危亡的大时代里，自觉投身体制，成为管理者之后，左右于“自由/民主”和“国家/道统”的内心矛盾和纠结。研究发现，这些浸染过“自由主义”底色的国民党新闻管理者，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角色的冲突和矛盾。早年的教育背景和记者从业经历，使他们在内心深处认同和向往自由主义的新闻事业；但他们自小又大多接受了良好的儒家传统教育，继承了中国传统文人“忠君爱国”、“先天下之忧而忧”的秉性，面对着内忧外患的国家现状，他们不约而同地做出了“救亡压倒一切，甚至是牺牲自由”的选择，毅然加入国民党宣传机关，做起了新闻官。但这也使得他们在面对党员/报人、党纪/职业伦理等诸多互为矛盾的角色和抉择时，进退失据。而真诚地拥抱权力和体制则使他们丧失了知识分子“议政参政”的土壤条件，最终沦落为国民党党政科层体制中的“事务性技术官僚”。

关键词

国民党、新闻管理者、角色困惑、职业抉择

作者简介

王明亮，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电邮：727794118@qq.com

秦汉，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与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地亚哥分校传播学院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电邮：20110051113@cyu.edu.cn.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中国共产党城市办报史研究（1921-1949）”（项目编号：15BXW010）的阶段性成果。

From journalists to officeholders: The Career Choices of KMT's Propaganda Administrators

An discussion focused on Dong Xianguang, Zeng Xubai and Ma Xingye

Wang Mingliang, Qin Han

Abstract

This thesis attempts to interpret the inner conflict and entanglement of journalists in KMT and takes Dong Xianguang, Zeng Xubai and Ma Xingye for example, who are in a dilemma between “Liberty & Democracy” and “Country & Confucian Orthodoxy” in an age of deepening national crisis. It can be concluded that role conflicts and contradiction existed in various degree in those journalists in system of KMT, who have been imbued with liberalism. As advocates of liberalism, they identify the concept and yearn for the freedom of journalism, but they have been cultivated by the traditional Confucianism from an early age and inherit those virtues from traditional literati, such as patriotic and loyalty to the monarch, first concern about the world. They accept the idea “saving the nation overriding at the cost of freedom” and put into practice coincidentally by participating in propaganda department of KMT in face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troubles. However, that also makes them caught in a dilemma, when facing with party members & journalists, party discipline & professional ethics. The attraction of power and system make them less accessible to the participation in the administration and discussion of state affairs, and eventually they become technical officers of the hierarchical system of KMT.

Keywords

KMT, Journalists, Role Confusion, Career Choice

Authors

Wang Mingliang is a doctoral student at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in Jinan University. Email: 727794118@qq.com.

Qin Han is Joint PhD. Student of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and Department of Communication at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 20110051113@cyu.edu.cn.

This paper is a part of the research project “Study of Histor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ity Newspapers(1921-1949)” (Project Number: 15BXW010) sponsored the National Social Science Found.

教授、理论家和职员，都为当权者工作；我边干活边挨骂，我为骂我的人工作。

——罗伯特·默顿

一、前言：问题与方法

报人研究一直是中国新闻史研究的重要题材。过去30年，在中国新闻史研究成果中，报人研究占据了相当比重，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检视这些研究成果，基本都是中共报人、左倾报人或中间偏左报人的研究，关于国民党新闻工作者的成果则并不多见。这与当下学界对既往新闻史研究成为“中共报刊史研究”的反思结果在面相上也是一致的（方汉奇,2007）。而真实的历史情况是：基于对宣传功能的认识，国民党历来十分注意宣传人才的延揽和培养。1928年底国民党在形式上完成了对全国的统一，逐步建立起一套以中央社、《中央日报》、中央广播电台为三大支柱，以中宣部各地直辖党报、电台和各级党部直辖党报、电台为辅的党营新闻事业网。北伐以后各地新办报纸中，党报即占十之六七（方汉奇,1996:358-360）。随着党营新闻事业的迅速膨胀，国民党依靠其掌握的政经资源，罗致了一大批新闻从业者，从事党营新闻事业和宣传管理工作。有些人在中国近代新闻史上亦曾留下了显赫声光，成为中国近代新闻史研究不能回避的人物。如果对国民党体制内的新闻工作者进行一个简单分类，笔者认为可以约略分为三大类：一是曾经做过职业新闻记者，但后来从事新闻管理工作的“新闻官”，如董显光、马星野、曾虚白、陶百川、萧同兹、陈博生、程沧波、叶楚傖等；一类是终身未能进入管理层，以记者身份终其一生的，如陆铿、龚选舞、乐恕人、徐咏平、徐佳士等；还有一类是以国民党官媒记者作为晋身跳板，后来从事其他工作的，如赖景瑚、叶公超、阮毅成等。然而目前新闻史学界，对这三类国民党新闻工作者的研究，都较为薄弱，特别是把他们分别作为一个代表性群体，进行整体考察的研究，更是少见。

本文将以第一类国民党新闻工作者即新闻管理工作者为研究对象，考察他们从职业记者晋身“新闻官”的职业抉择历程，并尝试引入社会学中的“角色”概念，分析他们在“党员-报人”这一复合角色里的内在冲突和内心斗争。同时，本文还想回答这样一系列疑问：为何若干赴欧美学习“自由报业”的人士回国后成为国民政府的新闻检查官员或投身国民党新闻事业中？面对党员/报人的角色冲突和党纪/新闻职业伦理的矛盾，他们何以自处？内心有怎样的痛苦？面对角色的冲突他们是如何调试自己的内心世界，并劝服自己的？在与决策制定者特别是领袖的互动中，

他们的结局如何?这些都是需要中国新闻史研究者回答的问题。

诚如前文所言,国民党内从一般职业记者晋身为管理者或曰“新闻官”者,一直不乏其人,要对他们逐个进行考察,显然非一篇文章所能驾驭和涵盖。本文将选择董显光、马星野、曾虚白三个人物作为典型代表,对上述问题进行考察。

在展开论述之前,笔者将先交代选择这三个人物的理由。虽然从整体上来看,他们三人都是从新闻记者到新闻管理者的代表,但是细细考察,则会发现,他们后来在体制内的角色也有微妙的差异。因为后文在考察他们的职业抉择和职业行为时,要不得不考虑他们与政治权力拥有者特别是领袖的亲疏关系,因此,笔者选择了与蒋介石有师生之谊的董显光和马星野,又选择了在国民党内派系归属不是特别明显,与蒋也没有明显关联的曾虚白作为对象。董是蒋的浙江同乡,年轻时曾做过蒋介石的英文老师,又是宋美龄向所倚重的人,被目为“官邸派”、“夫人系”重要人物(翊勋,1955:113-114)。马星野则是蒋介石任校长的中央政治学校的学生,又是在蒋的支持下才得以遂愿留美学习新闻学,他本人对蒋始终有一种学生心态。他称蒋为“毕生最感戴之人,亦毕生最钦佩之人。二十六年间,追随未尝间断。单独召见,亦近十次,慈祥恺悌,如坐春风。”(马星野,1951)。曾虚白的人生与蒋并没有发生职务关系以外的交集,其人终其一生,也未能进入权力的核心圈层(林果显,2014)。此外,这三人在后来从事的主要职务上,也有不同,董显光和曾虚白担任的是负责国际宣传和新闻检查工作的国际宣传处的“党官”,是宣传意图的制定者;而马星野最重要的职务则是《中央日报》社长,这个职务既要听命和执行来自领袖和宣传管理部门的宣传指示,又负责具体新闻业务的帛画工作,而这两方面有时候并不能总是合辙,甚至是完全冲突的。这种与领袖的亲疏关系,以及所从事的岗位在职务定位和职务行为上的差异,都影响着他们的职业抉择和职务行为。此不赘述,留待后文继续考察。

除了考虑上述内在因素外,笔者还不得不考虑一些历史研究者所经常面对的“客观限制性因素”,即历史材料的留存情况和易得性问题。历史研究能用哪些材料、研究什么、能研究到什么程度,有时候是带有很大的偶然性的。比如历史学界研究清末乡居知识分子,多选择山西落第文人刘大鹏。但原因可能并不是刘大鹏本人在同时代的乡居文人中有多大的代表性,只不过是留下了长达40年的《退想斋日记》,而其他人士可能没有留下什么片言只语作为“历史资料”。再有,目前国内的新闻史研究,对《申报》、《大公报》的研究要比《时报》和《新闻报》充分,也并不是说前两者比后两者更有代表性,只不过是前两者出版了影印版,许多大学

图书馆有购藏,使用较为方便,而后两者只有原报或缩微胶卷分藏在各地图书馆、档案馆,限制了研究者的使用频次。这样的例子在历史研究中比比皆是。本文要考察他们的内心纠结与挣扎,就不得不分析他们自述的心迹剖白,这势必非得依靠日记、回忆录、自传或档案不可。而这三人恰好都有自传或有专门的回忆文章,对早年的家庭生活、教育经历、在国民党体制内的工作经历,有过详细的记述。本研究所使用的主要材料包括:《曾虚白自传》、《曾虚白工作日记》、《马星野先生纪念文集》、《董显光回忆录:一个中国农夫的自传》、《China and the World Press》、《Dateline China: the beginning of China's press relations with the world》,以及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馆藏马星野档案。这些自传或回忆,可方便我们对他们的性格养成、职业抉择进行探幽入微地考察。另外,三人的生活和工作经历互有交叉和勾连¹,在彼此的回忆和传记中都有相互呈现,也便于我们的比照考察。为方便行文,本文在论述时,将按照三人出任管理者的先后顺序来展开,依次是:董显光、曾虚白、马星野。

二、国家需要压倒个人意愿:艰难的职业抉择

一个人的成长总是要接受三方面的教育: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现代教育心理学已经证明,个人的家庭成长环境和青少年时代接受的教育对一个人的性格和品质的养成,具有极为深远的影响。三人都接受过比较良好的传统教育,同时又有教会大学或欧美留学经历²,特别是董显光和马星野,更是接受过美式新闻教育的训练。无论从出生时间、成长和教育环境、人生履历来看,他们都非常符合许纪霖对“后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的定义,是典型的“后五四”知识分子³。

“后五四知识分子”生活在一个十分独特的历史时代:帝国主义入侵,民族矛盾加深,国家命运风雨飘摇。周纵策表示,“‘五四’时期虽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视个人价值和独立判断的意义,但又强调了个人对于社会和国家所负的责任。这种情况不同于现代西方社会中个人主义的诞生,因为面对着帝国主义的侵略,当时中国的问题还是民族国家的独立。”(周策纵,1999:501)李泽厚曾将这一时期知识界弥漫的爱国思潮概括为“救亡压倒启蒙”,即“救亡的局势、国家的利益、人民的饥饿痛苦,压倒了一切,压倒了知识者或知识群对自由平等民主民权和各种美妙理想的追求和需要,压倒了对个体尊严,个人权利的注视和尊重。”(李泽厚,1987:33)

三人都曾打算以新闻记者作为自己的终身职业,后来都因为相似或相同的原

因，步入了另一条人生轨道。董显光和曾虚白都是以做一个记者为志业，后来因国难当头，基于知识分子的爱国情怀，毅然投入到国民党体制内，做起了新闻检查官。马星野的情况稍有不同，因为他本人和蒋介石有“师生之谊”，当初赴美留学时，又是在蒋介石的支持下才得以遂愿，入密苏里新闻学院学习新闻学，所以后来的职业选择更多是出于蒋的安排。

（一）董显光：我不赞成新闻检查，但我要改善这种制度

董显光是中国第一个赴密苏里新闻学院学习新闻学的人⁴，后来又成为哥伦比亚大学普利策新闻学院的第一届学生。1913年，董显光返国，先担任上海数家报纸驻北京的通讯员。后经孙中山先生介绍，到上海担任英文《国民日报》的副总编辑职务，由此开始他的记者生涯。1914年，他再度赴京，担任英文《北京日报》的编辑。1918年又升任上海《密勒氏评论周刊》的编辑。1925年起，担任《天津庸报》的编辑达六年之久。30年代初，董显光的工作重心转到报业行政管理上，先后出任上海《大陆报》的总经理，《时事新报》、《大晚报》和申时电讯社的发行人等职务，成为上海新闻界的领军人物，曾“很享一时盛誉”。他认为无论用西方哪一种政治尺度来衡量，自己都是应该属于所谓“居中偏左的自由分子”的。他说从在美国念书的时候起，因为受到自由民主的空气的潜化，便很自然地把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认为是一个优越的民主国家的必要性能。他认为任何号称民主的国家如果没有出版自由之基础，或不能向着这一目的而诚实地努力，则所谓民主，也无非是欺人之谈而已，实在不免挂羊头卖狗肉之嫌。他认为自己担任中国的战时新闻检查局长一职，是与自己所认同的出版自由观点背道而驰的（Tong, 1950: 260-261）。那他为什么还选择了新闻检查官作为自己的职业呢？他如何能自圆其说，说服自己？

董显光在自传中的一番夫子自道，向我们揭示了他面对职业抉择时的心境。他说：

在我养病期间，突然接到蒋委员长身边的一位客座顾问端纳先生的来信，要我为了国家前途着想，考虑接受检查外国新闻电讯的任务……他解释道，目前中国正因为检查外电处理失当，在国际新闻界遭遇空前的挫折。他看着中日关系日转恶劣，中国需要国际间正确的了解比任何时期更为迫切。他又说蒋委员长夫妇经常接到外国记者申诉电稿受过多检查的抗议。有的电讯被检扣后所余字句无几。实使中国在国际宣传上陷于重大不利。我同意端纳的看法，这是亟待补救的缺失……我虽然像一般新闻记者一样不赞成这种检查，可是现在要我改善这个制度却符合我的兴趣。我以为贡献我的能力透过新闻给中国培养国际好感是我应尽的责任。我毅然决定接受了这个任命，就准备在上海成立一个

检查外电的机构。(董显光,1973:112-114)

在致美国《时代》和《生活》周刊老板鲁斯的一封信中,他态度更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曲中:

就个人方面说,我对严密的检查制度是深恶痛绝的,可是在当前中国的局面之下,敌人占据了绝大部分国土,一个政治团体差不多公开地反对政府,而拒绝诚意合作以抵抗外国的侵略者,检查制度对她无疑是非常需要的。检查制度对于拍往国外的新闻,不能不尽可能防止其协助敌人,以免使其获得宣传的资料。检查制度的需要情形,从敌人的宣传广播上可以得到证明,例如日本同盟社便常常引用重庆某些记者的消息,而这些记者,就我们的经验看来,是不能保持一种良好的客观立场的,他们的批评,破坏性的成分多,而建设性的成分少。(Tong,1950:260-261)

但他的上述说辞显然并没有让他的西方朋友们满意。在回应美联社社长Kent Cooper的质问时,他将新闻检查与商品出口检查相提并论,为自己辩护。他坦言:

采访新闻一事,在若干方面可以与商人在国外做生意相类比,这些商人把一国的著名物产贩运到他国去赚钱,他们自然是憎恶任何对其贸易自由的限制的。然而,他们经商的国家之政府,却有着绝对的权力检验出口的货物,防止有缺陷或违禁商品流出。这与新闻采访者一样,只是采访者要出口的是新闻而非商品。政府也同样有权监控和禁止非法资讯的输出。(Tong,1950:260-261)

总之,他认为“在这国难时期,每个人都应该将其最适用的才能贡献于国家。我最好的贡献,就是将我的多年的新闻工作经验服务国家。在当时的中国,还没有一个人像我这样深刻理解利用外国渠道和西式办法进行宣传的重要性。”

马星野的回忆也印证了董自己的说法。马星野称,抗战时期某一晚,他与董显光、汪英宾、赵敏恒等几位密大新闻学院校友餐叙,汪英宾醉酒后责备董显光离开新闻岗位,违背了当初在密大新闻学院时终生做报人的誓言。董显光解释道:“离开岗位,并不是出于自愿”(马星野,1982)。

(二) 曾虚白:以跳火坑的精神,参加政府抗日阵线

曾虚白走上新闻记者的道路,是受董显光的鼓动和影响。董显光从美国学习新闻学回国,以美国报纸为模板,在天津创办《庸报》。董显光因看重了曾虚白的才能,拉他入伙。曾虚白听了董显光的劝说,很受鼓舞,打算认定新闻事业做自己

的终身职业。而帮助董显光筹办《庸报》的过程更使他对新闻工作着了迷（曾虚白,1988:71-72）。

1931年他又在“四社”总经理张竹平的劝说下，出面创办了《大晚报》。创刊不久即遭遇八一三淞沪抗战，《大晚报》凭借自己的采访网，迅速将当天战事消息发表，满足了市民及时了解战事进展的要求，因而一炮走红。然而正当业务蒸蒸日上之时，他却选择了关闭报纸，毅然投身参加了军事委员会第五部，从事抗战宣传工作。曾虚白从民间报人到国民党宣传官员的角色变化，也是基于国难情形的考虑。他回忆，“一二八”事变后，曾与负责与日媾和的黄膺白做过一番长谈。黄表示：“做不做官是一回事，国家兴亡，做一个公民，应不应该对国家尽责是另一回事。办报主张抵抗，是尽一份公民应尽的责任；国家危急的时候强迫一个公民去做官，也是他不能逃避的责任。”受此感召，曾虚白也当场表示“我愿向膺白先生保证，真有一天政府发动抗日战争，我决心放弃手创的《大晚报》，学着你跳火坑的榜样，参加政府抗日阵线（曾虚白,1988:135-137）。抗战爆发后，曾虚白果然脱离《大晚报》，担任了国际宣传处处长。

中国的文化传统里本来就有读书人“投笔从戎”的传统。正是在这种“国家有难，匹夫有责”的信念支撑下，很多文化人自觉地投身到了国民政府的行政、党务工作里，为抗日尽一份力。不独新闻界人士如此，整个文化界、知识界都弥漫着这种情绪，包括胡适衔命担任驻美大使，郭沫若出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任少将厅长都是受这种责任感和使命感所驱使。董显光称“在中国的现政权之内，有很多自由分子正担任着很重要的工作”是相当符合当时的历史事实的。

明乎此，我们才能解释，为什么“入幕”做事如此艰难，还有那么多曾留学欧美学习“自由报业”的人主动进入“体制”内，做起了国民党的“新闻官”甚至是看起来与新闻职业者势同水火的新闻检查官员。

（三）马星野：校长派我去做，我当全力以赴

在1949年以前，马星野工作仅三易：一是办新闻教育（1934-1943年，共10年）；二是任职中宣部新闻处处长，主持新闻管理（1943-1945年，共3年）；三是办《中央日报》（1945-1952年，共8年）。而这三次人生择业都是出自蒋介石的安排。

第一次是他1934年自密苏里新闻学院学成归国，面临人生第一次重要职业选择之时。密苏里新闻学院求学期间，院长威廉博士曾召见马星野，勉以“当你选定新闻作为你的职业时，就好像自己已许过的姑娘，你决不可反悔！”（乔志高,1984）

该年5月,马星野乘船回国,抵达上海后,在上海勾留了一段时间。《申报》老板史量才、“四社”总经理张竹平(当时,张竹平拟新办《大光报》),均欲留马工作。马星野也有所动容,曾在《申报》做《南行小记》一文,有“我现在已在中国。人家说中国是一个修罗场,我却愿意在修罗场中转一转”之语,流露出立志在新闻界大干一场的意愿⁵。不过恰在同月,他在南京中央党务学校(此时已更名中央政治学校)时的校长蒋介石电招其返回南京办新闻教育。蒋介石在南京黄埔陆军军官学校校长官邸接见了马星野,蒋问其志愿。马星野回答:“愿终身从事新闻事业”。蒋介石劝其投身新闻教育,说:“从事新闻事业容易,但新闻人才难得;你要从事新闻事业,应先办新闻教育。”(马星野,1935)这样马星野白手起家,创办并主持中央政治学校达8年之久。

第二次是1943年初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新闻处原处长彭革陈调任专员室主任,宣传部长张道藩指定马星野出任遗缺。现在没有直接证据表明蒋介石干预了这次人事调动。但考虑到当初是蒋指定马星野负责在中央政治学校新闻系办新闻教育,且八年之间,马星野将政校新闻系办得有声有色。若对马的职务有所更动,必先已知会蒋,甚至可能就是蒋的授意。

第三次则是抗战胜利前,蒋介石钦点其为复刊后的南京《中央日报》社社长。当时中央政治学校的新闻教育正办得风生水起,马星野也有要继续从事新闻教育的打算。当时的情况是《中央日报》在不到7年时间换过5任社长,成了无人敢问津的位子。《中央日报》的人选问题,一度成为令蒋介石和幕僚陈布雷极为头疼的问题。战时曾两度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的王世杰在日记中曾透露说,蒋介石认为“党中竟无一人能办报,实属可耻”(王世杰,2012:504)。蒋介石病急乱投医,临时抓差,点将马星野。面对突如其来的任命,马喜忧参半,但是面对蒋介石的知遇,他又无力抗拒,曾有一番自陈:“校长派我去做,机会难得,我当全力以赴,以不负校长的期望”(马之骥,1986:273)。

三、党员/报人之间:国民党新闻从业者的角色压力

20世纪20年代,美国社会心理学家米德将“角色”概念引入社会学理论。随后,许多社会学家开始了对角色理论的研究。社会学中的“角色”主要指个体在组织中的角色扮演,每一个角色都表明个体对他人和组织要尽相应的义务和责任。

“角色压力”(role stress)这一概念最早由社会学家Kahn等人(Kahn et al.,1964)在1964年提出,通常被定义为一种组合结构的概念。当组织中的个体对其所处职位

的角色期望感到不确定或无法胜任时,或者面对冲突的不一致的角色期望时,其内心会体验到一种不舒适或焦虑感,这就是角色压力。目前,角色压力已成为组织行为学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角色压力普遍存在于跨边界活动类型工作中。一般认为,造成角色压力的来源维度有两个:角色模糊(role ambiguity)和角色冲突(role conflict)。

角色冲突是指个人担当的社会角色包含矛盾的角色期待时出现的问题。1957年由美国社会学家默顿(Robert K. Merton)创用。角色冲突包括三种基本类型:(1)同一角色内部的冲突;(2)个人同时充当的多个角色间的冲突;(3)个人为自己规定的角色与他人要其充当的角色之间的冲突。其中第一类也叫角色内冲突,后两类统称为角色间冲突。角色间冲突也往往转化为角色内冲突,通过角色内冲突的形式表现和完成。

(一) 角色模糊:我是新闻检查员,还是新闻从业员?

角色模糊指的是主体对一个给定的角色的期望或规定缺乏明确的理解和认识。国民党的决策者们,特别是领袖本人,无非要其掌控的新闻宣传机构实施两个基本职能:积极的舆论宣导和消极的压制不希望听到或不希望民众听到的声音。决策者和领袖本人仅提供模糊的决策,而将转化为明确的行动纲领和具体行动的责任委之于这些体制内新闻从业者。这类并不特别具体的要求给体制内的新闻从业者们以最大的回旋余地,但同时也给他们带来无形压力。惟其目标指向性模糊,才更难以操作。他们在履行职务时如履薄冰和动辄得咎,实亦因此造成,三人之中,从工作经历来看,马星野身份更为简单、纯粹一些,其主要的新闻从业经历是担任《中央日报》社长和中央通讯社社长,角色定位相对清晰。而董显光和曾虚白则相对要复杂一些,面临着更多的角色模糊带来的困扰。董、曾二人早年都以办报起家,暴得大名,积累了晋身从政的资本,后来被国民党政府罗致到体制内,担任中宣部主管官员。但这个工作,曾给二人带来相当大的困扰。

他们的新闻教育和记者生活经历,使他们十分同情和理解外国记者坚称的“新闻自由”的理念。他们都认为应该尊重新闻规律,实施宽松的新闻检查政策,并尽量供给外国记者需要的新闻消息,以博取外国记者之同情,借外国记者之笔,宣传中国抗战的故事。但是董和曾的做法,却不能谅解于当道。当时国民党内对国际宣传处的主要工作定位即是负责对外国驻华记者的新闻稿件进行检查。曾虚白认为“论理,担任了宣传工作就不应该兼任检查工作了。因为,宣传时要人家帮你说你要说的话,重在培养同情,可是检查却是不要人家说你不要说的话,就难

免伤感情了。”（曾虚白,1988:180）董显光也抱怨道：“政府中若干负责长官仍对处理新闻关系观念模糊，未能深切了解西方记者的立场与观念，致令我的处境有时深感困惑。我深思熟虑争取美国作家与新闻记界对我政府与人民之好感，每不能得政府中若干领导人物的了解与同情，经常在无法解决之困扰中挣扎着。”（董显光,1973:122）如皖南事变发生后，国民党为不致引起外国舆论普遍担心中国再次陷入内战，从而导致对日作战失败，影响世界反法西斯战事的大局，也为了继续维持“国内团结”的表象，以争取美援，对事件采取了息事宁人的态度。董显光的直接上司、时任宣传部长王世杰，即主张不将问题公开化和表面化。国际宣传处不得不奉命删扣外国记者的新闻报道，引起外国记者的反感。但仍有若干外国记者避开国民党政府的新闻检查，取道香港将电稿发出去。如《西行漫记》的作者斯诺也从香港发出一篇报道，预测中国在1941年会发生大规模内战。

董显光事后检讨，认为：

冲突事件本身，在当时，我认为是可以调停的兵家小事，叫我头疼的倒是政府坚持扣发新闻。政府发言人既拒不与外国记者讨论这个问题，就算偶尔碰上，也常是躲躲闪闪，掩饰其词，反不如中共的坦率报道，更容易让外国人相信。他们持缄默政策的理由是怕内部冲突宣扬出去，徒令“亲痛仇快”，增加国共双方和平解决争端谈判的困难。那时我对这决定曾表示过怀疑，迄今仍惋惜不已。中共抓住时机，抢先发布了新四军事件的消息，使政府陷入不利地位。国际人士听了中共一面之词，对政府后来的解释颇不置信，一般人都认为发动事变的不是中共，而是政府。（Tong,1948:157）

董显光认为自己的任务是“给陷在重围中的中国跟外边世界建立一座友好的桥梁”，而“这座桥梁的主要支柱只靠在重庆的一小撮外国记者，他们负担了把战斗中国介绍给全世界的责任”（董显光,1973:213）。出于现实考虑，他十分清楚，绝不能与外国决裂，因此只能在国民党政府和外国记者之间折冲樽俎，做裱糊匠的工作。两面皆不讨好，内心十分痛苦。后来在回忆录中坦白这一工作的苦恼：“我不仅要负责检查新闻，还要负责发布新闻。这两个工作是相互矛盾的。当时我如果晓得工作前途的困难，而且要整整花上八个年头的話，我想我也许早就犹豫不肯接受了。”

（二）角色冲突：我是党员还是报人？

相较于董显光和曾虚白因角色模糊带来的困扰，马星野身上则更多凸显的是角色冲突带来的苦恼。当然这并不是意味着单纯从事新闻实务工作的国民党新闻工作

者，就无需面对角色模糊的苦恼。事实上，对于把《中央日报》办成报纸还是喉舌，国民党宣传事业的掌舵者们没有清晰的认识，致使《中央日报》的实际主持者进退失据、没有方寸。例如，如果按照新闻事业的经营规律来说，新闻贵在抢先，但是陈布雷给《中央日报》主编蒋君璋的指示（一般认为陈的意思即代表蒋的意志）却是“不是为自己写文章，是为党的需要立言，不可因为在新闻上有落后之感而抢着发布新闻，或发表言论。”（陶希圣，1978:30-31）“同一消息，其它各报也许可以发表出来，只有《中央日报》不得任意发表。”（陶希圣，1965）

马星野之前担任过《中央日报》社长一职的陶百川，因为记者卜少夫抢发了独家新闻《中美、中英新约明年元旦正式公布》，惹恼了外交部长宋子文，蒋介石也大发雷霆。而这件被陶百川称为“报难”的事件，其事实和起因非常清楚。这条消息全文共34个字：“据关系方面称：我与美英之新约，全部业已草成，且经商妥，明年元旦日即正式公布云”。消息是卜少夫得自中央社编辑傅剑秋，而后者则是从中央宣传部的宣传指示中看到的，《时事新报》也曾刊登过类似消息。消息并无透露新约内容，且事先已经送新闻检查处验讫放行，报社在处理上并无不妥之处。但是中央党部仍将总编辑袁裕业交军法审判，卜少夫罚薪三个月。社长陶百川被迫辞职，“对记者生活从此感到毫无兴趣了。”（陶百川，1979）消息不能争胜，报纸自然无人问津，中央要求的宣传效果必然达不到，反过来还要受批评。于是很多人就干脆对这个位置唯恐避之不及，出现了“能者均志不在此，不能者又不敢轻试”的局面（马之骥，1986:388）。这种角色内的冲突成为长期困扰国民党报人的难题，马星野自不能免。1950年代，《中央日报》迁台后，马星野曾决定不登各部会送来的长宣言与长文章，结果得罪了不少人。

除了上述角色内的冲突，马星野身上其实有两个互为冲突的身份：一方面他是国民党党员，要服从党的纪律，服从党的意志和党魁的命令；另一方面他又是一个报人，以新闻职业者的身份相期许，不得不遵从基本的新闻伦理和记者职业道德。这种不同角色间的内在的张力，导致他在执行职务行为时的角色间冲突。

蒋介石对宣传问题极为重视，1948年至1949年曾成立一个非常设性组织“宣传指导小组”，由陈布雷任召集人，召集重要的文化、宣传主管人员开会，商讨应对方策，外间称之为“官邸会报”，负责“传达宣传指示，拟定宣传政策和方法”。

（蒋君璋，1968）此一时间也正是马星野掌管《中央日报》时期。为了全面掌握《中央日报》的言论，国民党中央通过该报董事会将该秘密小组成员、中宣部副部长陶希圣任命为该报总主笔，负责该报社论写作。陶希圣在社内提出“先中央、后日

报”的主张，认为报纸既是党的机关报，要以站在党的立场为第一要务。而《中央日报》一班以采访部主任陆铿为代表的年轻记者则针锋相对的提出“先日报、后中央”的主张。他们认为报纸如果一开始就板起脸来，做出一副“中央姿态”，弄得面目可憎、语言乏味，报纸没人看，即使“中央”立场站得再稳也达不到宣传效果。

其实“中央”和“日报”之间的矛盾，背后反映的是国民党报人的“党员”和“报人”之间的角色冲突。作为社长的马星野只好在两方之间做平衡，一方面在言论立场上尊重老资格的陶希圣，另一方面则对手下记者采取放任政策，不愿过多干涉，甚至私下予以认可和激励。

马星野对“先日报，后中央”的认可和默许，终于招致事端。1947年7月29日，陆铿趁马星野生病不能视事期间，在报上刊发了一则标题为“孚中暨扬子等公司破坏进出口条例，财经两部奉令查明”的报道，揭发孔、宋两家公司利用政治特权在1946年3月至11月，结汇3.3亿元的事件。陆铿爆出孔宋贪腐案后，蒋介石命令中宣部长李惟果、副部长陶希圣向陆铿施压，要求其供出消息来源。陆铿本着职业报人的良知，拒绝提供消息提供者姓名。蒋介石乃有“我是总裁，他是党员，不管什么记者信条不信条，按照党的纪律，总裁命令党员讲出来”之语（陆铿，1997：172）。蒋介石这样讲，也并非无所本，因为早在1935年11月18日，蒋介石亲自拟定《中国国民党党员守则》十二条，提经中国国民党第五届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其中第七条明确规定：“服从为负责之本”。这里便发生了党员和报人角色的尖锐冲突。后来陆铿迫于这种角色冲突带来的压力不得不动离职。

1948年4月这样的事情再次发生。刚入职《中央日报》不久的徐佳士，在12日国民大会采访到一则争议性新闻，徐佳士写了一篇报道《检讨军事问题/各代表坦白发言/提出积极性建议》，发表在13日《中央日报》第2版，内容为国大代表在国民大会大骂当时的行政院长陈诚在东北败北，因而提出“杀陈诚以谢国人”。这件事情引发轩然大波，让马星野受到高层极大压力，他也未曾处罚过任何一个人。过了一段时间，马星野知道新闻是徐佳士写的，在私下场合里对徐佳士说：“佳士，你是我的学生，你做得好。”

从以上这几个事例中马星野表现出的举止可以看出，身为国民党党报社长的马星野，对国民党内部的腐败堕落，是很不满的，对报纸和记者的职责也有清晰的认识和期待。不过他的党报社长角色又使他不能偏离党国的意志太远。饶是如此谨小慎微，在主持《中央日报》期间“错误过失，不可以数计”。

四、职业悲剧：沦为科层组织中的“技术官僚”

罗伯特·默顿在《社会理论和社会结构》中将知识分子分为两大类：在科层组织中行使咨询职责与技术功能的知识分子和不从属于科层组织的知识分子（罗伯特·默顿，2006：367）。而划分标准则是他们的“服务对象”不同，前者的服务对象是政府决策者，而后者的服务对象是公众。这一分类其实亦相当程度暗合了国民党统治时期知识分子的分野，对应于前者的是马星野、董显光、曾虚白这些奋不顾身投身于体制的文人；而对应于后者的则是与权力始终保持若即若离的暧昧关系的傅斯年一类文人，当然更包含了与体制绝不苟合的中共知识分子及其外围分子。所以默顿关于科层体制中的知识分子的阐释，对探讨国民党体制内文人的职业悲剧亦有相当的解释力。

默顿认为，许多知识分子投身政治活动，都有一个初衷，即不再站在边线上观看，而是愿意通过在公共科层组织中占有一席之地，更接近于重大决策的真实轨迹，从而帮助创造历史（罗伯特·默顿，2006：368）。根据前文所述三人的职业抉择历程来看，他们之所以在记者职业处于巅峰时进入政府，都有投身历史中心改变乃至创造历史的心态，特别是董显光更是明白无误地宣示要改造不合理的新闻检查制度。

但正如默顿敏锐地发现的那样，知识分子一旦进入科层制政府中，就会被体制所裹挟，不由自主朝向两个方向转变：（1）情感和价值观上更加认同占统治地位的群体的情感和价值观；（2）被改造为没有政治头脑的技术专家（罗伯特·默顿，2006：361-380）。

因为出身背景和早年教育的影响，他们对国家和领袖存有情感束缚，更因为信守“奉献国家”的信念，在国民党党国同构和一个领袖一个政府的情形下，这容易使他们误以为服从决策者和领袖本人的意志，即是服务国家的途径。服从，不但是职务要求，更是道德要求。这使得他们在情感和价值观上渐趋与“占统治地位的群体”保持一致。从党国机器内部来看，蒋介石是国民党的党魁和政府首脑，三人都是国民党党员，是国民党宣传机器上的一个零件，因此他们之间事实上存在着“长官一下属（君一臣）”关系。按照费孝通的社会差序结构来看，这是一种尊卑关系、主从关系，其实质是“命令—服从”关系。

蒋介石个人表现出的许多举动，都表明他是属于典型的“权威型管理者”⁶。据称他每天必看的两份报纸，一份是《大公报》，一份是《中央日报》，还不时做圈点，一旦发现《中央日报》出现他认为不合适的地方，有时直接越过中宣部，电

话打到报社对主管人员严加呵斥（陶希圣,1964:222）。1945年7月，蒋更曾以《中央日报》编辑、社论与“小评”的水准“幼稚拙劣，虽中学生犹不如也”为由，要求有关部门将编辑与评论者尽速调换（张瑞德,2005）。《中央日报》作为一份党报，在身居党魁的蒋介石个人看来，“《中央日报》是代表我的报纸”（薛心镒,2003:12），绝不见容与自己意愿或喜好相违背的报道和言论刊登。因为有这样一位“天字第一号读者”，因此《中央日报》的社长和总编，整天处在精神焦虑状态之中，要时时揣摩上意。而负责指导宣传工作和新闻检查工作的宣传部职员也战战兢兢，唯恐出错。

面对蒋介石这样一个强势的“权威型管理者”，他们的“下属心态”和“书生”气质，使他们很难招架和对抗蒋的权威和压力。陆铿评价马星野“有办一张好报的理想，而他的国民党中央党校毕业的历史背景和他的国民党候补中央委员的地位，却对他是一种约束。加之，我们这位老师书生秉性，谦谦君子，以慎为健，更决定了他的作风，不敢放手大干。”（陆铿,1997:96）这种心态在董和曾身上也很明显。二人的回忆录中，处处可见对领袖蒋介石近乎阿谀的溢美之词，显示出在面对权威时的柔弱屈从姿态。董显光更是以惧怕蒋介石出名，据很多人的回忆，董接听蒋的电话浑身哆嗦，连一句话也讲不清（王正元,1993）。

根据默顿的说法，进入科层体制以后，改变态度的另一种方式还来自行动的压力，他们逐渐变得“理论性减少，但更实际”，即越接近决策的核心，越认同决策者的价值观，就变得越容易从技术和手段的角度考虑如何在既定的条件下执行政策（罗伯特·默顿，2006：375）。通俗地讲，就是越容易在既定的政策框架范围内，对执行过程进行小范围地修修补补。1946年初，马星野通知副刊编辑黄墅同摄影记者一起到南京下关和郊区拍摄一组从苏北逃难过来的流民生活镜头，用以印成画报，以便归罪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战争。黄归途中，又去太平路、夫子庙拍了一些达官贵人的纸醉金迷。两相对照，形成“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主题。蒋介石看后大怒，交下手谕一张，上写“《中央日报》竟有如此之画刊，《中央日报》竟有如此之画刊编辑，真是岂有此理，岂有此理！”。马星野回馆后责怪了黄墅几句，再没追究，并没有给涉事的记者黄墅施加更多的压力（承继云,1964:140-149）。但是他从此也养成了亲自看画报大样的习惯。

相较于马星野，董显光的委曲求全，更有典型性。他在出任军事委员会第五部（国际宣传处前身）副部长不久，即发现中国官场内，存在着一套与时代极不适应的沉珂：

中国官场里，因循守旧的处事哲学大行其道；官员中，勇于担当的更是鲜见。他们习惯把工作推给下属，一旦出错即可委过于人，还时常蛮横否决下属的决定和做法，以彰显自己的权威。这在上层官场中，尤其严重。这是一套官场流弊，但是在1930年代的中国，许多在官场里工作的人不得不去适应这套沉珂。他们沿袭的仍然是中国传统官场里的那套行为方式，而不是我们要致力于创立的共和国的行政方式。（Tong,1948:43）

作为负责新闻检查职责的国际宣传处的实际领导，他对国民党在许多新闻事件中奉行的新闻政策迭有责任言。如他对“皖南事变”后，国民党政府的愈来愈严格的新闻检查政策很不赞同，认为“这样一味地否认，只有欲盖弥彰。而中共呢，借助于新闻界的同情者，不理我们的新闻检查，总是能把他们持之有故的新闻送往英美去，结果是中共发出的新闻，身价日增。”（Tong,1948:165-166）但他却缺乏对这些不良政策的纠正勇气，只是原原本本地按照上峰的意思予以执行。以至于那些曾经与他保持着不错的私人友谊的外国朋友，也对他产生了不满情绪，如爱泼斯坦拒绝了董显光的到国际宣传处任职的邀请，转而受聘于工资微薄的联合劳动新闻社（爱泼斯坦,2004:139-140）。费正清则干脆认为董显光是个骗子，说“新闻局和董显光并不打算叫我们看见真实情况”（费正清,1988:105）。

在训政时期，最高领导蒋介石的个人权威日益加强，他的所谓“口谕”、“手令”成为凌驾政府决议文件之上的最高指示。据担任过国民政府行政院政务处长的何廉回忆，蒋总是随身携带一支红铅笔和一叠纸，如果他认为有必要做决定，就会立即签发一项有关的手谕（何廉,1988:17-118）。蒋介石所曾颁布过的手令，数量极多，据一位曾长期任职于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人士的估计，自1936年1月起，至1948年4月止，仅侍从室积累收藏蒋的手令，即有120余箱之多（秋宗鼎,1996:955）。根据张瑞德的研究，这其中有相当多是关于宣传问题的（张瑞德,2005）。据马星野回忆，蒋介石每有“口谕”或“手令”下来，中宣部和《中央日报》的负责人就紧张无比，必要根据蒋的指示和意见，连忙商讨应对办法或解决措施（马星野,1977）。而此时，“新闻道德”、“报人职责”一类从业准则都被抛诸脑后。如前文提及陆铿报道“孚中扬子案”后，向陆铿施压的陶希圣本人即同时担任《中央日报》主笔，陶希圣本人有很长时间报界从业经历，对“保护秘密消息来源”的新闻伦理不会不知。但在蒋介石的压力下，仍选择了违反原则，向权力妥协。而马星野在这件事情上的态度也值得玩味。马当时有病在身，得知事情以后给陆铿打过一次电话。但后来事件的处置过程则完全不闻不问。自己主管的报纸报道

惊动最高领导人，自己却完全置身事外，这无论如何不应该是社长应有的态度。笔者推测，马可能也趁生病不能上班为由，采取了不介入的“明哲保身”态度。可见在科层组织的压力面前，这些人事事实上已成了不能自由思想、自由选择的“听差办事”的“技术官僚”。

五、余论

1947年傅斯年在给友人胡适的信中说：“我们自己要有办法，一入政府即全无办法。与其入政府，不如组党，与其组党，不如办报。——我们是要奋斗的，惟其如此，永远在野，盖一入政府，无法奋斗也”（傅斯年，1947/2013:938）。与游离于体制边缘、与体制一直若即若离的胡适、傅斯年等知识分子不同，董显光、曾虚白、马星野却选择了一条反向的路：舍弃办报，而入党入政府。他们选择了真诚地拥抱体制，想不到却深陷无往而不在的制度枷锁里，成为体制的婢女，不能发挥全部所学，施展人生抱负。

1980年3月，马星野在重庆中央政治学校新闻专修科时代的学生、台北《中央日报》总编辑薛心镒，被从做了九年的总编辑职位，降职为主笔。马星野自报上得到消息后，给薛心镒去信进行宽慰，内中称：“办《中央日报》辛苦，做总编辑更苦，终日终夜，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而又在强势之民营报纸夹攻，及不负责任之批评者吹毛求疵之中。总编辑工作，几无时不紧张，无时不冒险……此种辛苦，星了解最深刻”（薛心镒，2003：37-38）。马星野这番惺惺相惜亦带有几番自况意味的宽慰之词，实在道出了国民党体制内报人的痛苦和无奈。个中滋味，如饮冰水，冷暖自知。

晚年的马星野，曾经这样跟学生楚崧秋坦露心声，回顾自己的一生：“如果我不从事新闻实务而以教育终身，可能我的贡献会比今天多一点；如果我有能力又有机会自己办报，可能我对社会大众有更多一点交代。”同样做过《中央日报》社长的楚崧秋，显然十分理解并同情自己老师的遭遇：“在他献身于此的近六十年岁月中，曾为崇高的新闻理想与理念而慷慨悲歌，倾心不已，同样的，由于他长期是一位具有明显政治信念与立场的新闻工作者，有时亦不免感到无助或无奈！”（楚崧秋，1991）

而董显光也有着同样的无奈和苦楚。他曾经两次萌生退意。第一次是在抗战胜利后，他在战时以宣传部副部长的身份负责国际宣传，可谓殚精竭虑。但是常常因为新闻检查的关系，两方面不讨好，一方面不能得到党政部门大员的谅解，另一方

面受到记者的指责，“夹在中层受尽无法辩白的苦痛”（董显光,1973:220）。更让他无法释怀的是，抗战八年换了十位宣传部长，他做了八年副部长。遇到最后一位宣传部长吴国桢竟是他女婿陈植的哥伦比亚大学同班同学。终于在战后选择了隐退，到美国纽约学起了汽车修理。一天，他对来访的老部下叶公超说：“车子总可以修得好，你可以看出毛病在哪里，了不起换个零件而已；要改革一个政府却不容易，你不知道从何处着手（There is more fun repairing cars than trying to serve the government）。”（叶公超,1982）第二次则发生在去台后不久。当时他作为《中央日报》的董事长，支持社长马星野“除总统与行政院文告外，不登原文照登的长宣言与长文章”，结果得罪了不少人。马星野被迫辞去中央社长职务后，他亦请辞，“未蒙中央核可，不得不继任旧职，然已失去努力的兴趣”（董显光,1973:282）。晚年在自传中，他回顾生平，认为自己如果永远守在新闻岗位上，应该是最快乐的人。（董显光,1973:333）

曾虚白晚年坚定认为自己终其一生是记者。他在自传序言中说：“我从三十三岁在天津跟董显光办《庸报》起，此后生活都在新闻记者岗位上转，从开书店、办杂志、创晚报、主持国际宣传、协办广播事业、组织心战训练、领导通讯社、到主持新闻教育，参加各行各业的新闻活动，因记者身份接触面之广而丰富了我生活的内容。”言辞之间，对记者的职业身份十分认同。

默顿在分析政府科层制内的知识分子和决策者的关系时说：“他们永远不十分清楚自己的前程是升入天堂还是被打入地狱。工作中他们得随叫随到，惟命是从，却又很少被认为是不可缺少的”（罗伯特·默顿,2006:366）。这多少也是三人的真实写照。回溯平生，三人竟不约而同地怀念起早年做记者时的生涯，流露出无限的怀念，而对后来选择走上政治道路，未能申述平生之志，也隐约表达了惋惜之情。这其中况味，实在值得反思。游离于体制边缘甚至与体制对立的那些知识分子，在政府眼里还是一种重要的社会力量。投入体制怀抱的这些知识分子，反而丧失了“议政”和“参政”的资本，沦为“事务性人才”。他们原本希望用自己的所学和专业特长，奉献社会，报效国家，但是却悲剧地成为权力握有者巩固专制体制的“技术官僚”。这可能是他们当初他们抱着救国心态，投入体制内时，所未曾预料到的。这不但是他们个人的不幸，也象征着许多以“飞蛾扑火”姿态投入体制的知识分子的不幸。

（责任编辑：李志敏）

注释 [Notes]

1. 董显光和曾虚白长期在国民党中宣部国际宣传处共事，彼此十分熟稔；马星野是董显光在密苏里新闻学院的校友，出掌《中央日报》时和董、曾的国际宣传处有十分密切的业务往来。
2. 三人之中马星野和曾虚白，都出生在传统的儒家知识分子家庭，后来都接受过西式高等教育。董显光稍有不同，年龄略长于上述二人，少年时代因家贫并未接受系统的儒家传统教育，是在当地教会资助下的教会学校才完成了少年时代的教育，后来又是在教会帮助下，负笈美洲。
3. 许纪霖在《二十世纪中国六代知识分子》中，以“五四”运动和“文革”为“历史的轴心”，对二十世纪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划分为六代，即“晚清知识分子”、“五四”知识分子、“后五四知识分子”以及“十七年”知识分子、“文革”一代、“后文革”一代。而“后五四知识分子”这个概念则是借自殷海光的论述。这代人在求学期间直接经历过五四运动的洗礼，是五四中的学生辈。他们大都有留学欧美的经历，有很好的专业训练，是知识分工相当明确的专家，其在历史舞台上活跃的主要年代在20世纪30-40年代。
4. 1908年密苏里新闻学院第一次招生，董显光次年在教会资助下赴美学习，先入巴克学院。1911年从巴克学院转学到密苏里新闻学院学习新闻学。董显光自传中称专攻新闻学，辅修国际史与法律，1912年取得文学士学位（B.A.）；同班同学中还有一位出生在夏威夷的华侨子弟黄宪昭，黄宪昭1908年作为第一批学生入学，1912年取得理学士学位（B.S.）。因此两人属于同年毕业。
5. 1952年4月，马星野曾在台北“革命实践研究院党政军干部联合作战研究班”第三期外交组受训，在提交给学院的一份“自述”中，他回忆当时心情，仍有“见长江巨浪，黄浦桅林，壮怀千里，匪言可宣”之语。见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馆藏马星野档案，档案号“099-01-01-01-001”。
6. “权威型管理者”是管理学中的一个概念。管理学的相关研究者认为，领导行为的有效性体现在“对工作的关心程度”和“对人的关心程度”上。在这两方面的不同表现，形成了多种类型的领导方式。其中，关心工作但忽略了人的那种领导，被称为“权威型管理者”。

引用文献 [Reference]

- 爱泼斯坦(2004).《见证中国:爱泼斯坦回忆录》(沈苏儒,贾宗谊等译).北京:新世界出版社.
- [Israel Epstein (2004).*A memoir of more than 80 years in China (Trans.)*. Beijing:New World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unknown).]
- 楚崧秋(1991年3月27日).执着于理想与现实之间:敬悼新闻界苦行僧马星野.《中央日报》,3.
- [Chu,Songqiu(Mar.27,1991). Cling to the idea and reality:Mourning the press disciplinant Ma Xingye. *Central Daily News*,3.]
- 承继云(1964).《抗战胜利后的南京<中央日报>》.载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

- 存稿选编第23辑》.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
- [Cheng,Jiyun(1964). Nanjing after victory of the anti-Japanese war .In The Chinese people's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 literature and information commission(ed.), *Save draft Ed literature and history data(23)*.Beijing: Chinese Literature and History Press]
- 董显光(1973).《董显光自传:一个中国农夫的自述》.台北:台湾新生出版部.
- [Dong, Xianguang(1973). *Autobiography of Dong xianguang: Statement of a farmer*. Taipei: XinSheng Publishing House.]
- 方汉奇(1996).《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二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Fang,Hanqi(1996). *A general history of journalism in China (2nd Vol.)*. Beijing: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
- 方汉奇(2007).1949年以来大陆的新闻史研究.《新闻与写作》,(1),39-40.
- [Fang,Hanqi(2007).Journalism history research since 1949 in Chinese mainland.*News and Writing*, (1),39-40.]
- 费正清(1988).《中国之行》(赵复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
- [Fairbank, John King(1988). *China Bound: A Fifty Year Memoir (Trans.)*. Beijing:Xinhua Publishing House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82).]
- 傅斯年(1947/2013).傅斯年致胡适.载《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Fu,sinian(1947/2013). Fu Sinian to Hu shi .in *Selected letters of Hushi(Vol. 2)*.Beijing:China Social Sciences Publishing Press.]
- 何廉(1988).《何廉回忆录》.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
- [He, Lian(1988).*Memoirs of He lian* . Beijing:Chinese Literature and History Press.]
- 蒋君璋(1968).布雷先生最后主持的一个小机构.《传记文学》(台北),13(6),15-21.
- [Jiang, Junzhang(1968). The last small organization presided by Mr. Bulei. Taipei:*Biographical Literature*, 13(6),15-21.]
- 蒋君璋(1978).《布雷先生对中央日报社论的指示》.载徐咏平(主编),《中央日报与我》.台北:中央日报社.
- [Jiang,Junzhang(1978). Instructions to the editorial of Central Daily News from Mr. Chen bulei. In Xu, yongping(ed.) ,*Central Daily News and Me*. Taipei:The press of Central Daily News.]
- 李泽厚(1987).《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北京:东方出版社.
- [Li, Zehou(1987). *Modern ideological history of China*. Beijing:Oriental Publishing House.]
- 林果显(2014).来台后曾虚白的宣传工作与理念.国史馆馆刊(台北),39,117-157.
- [Lin, Guo-Sian(2014). The Work and View of the KMT's Propaganda Staff after 1949: A Focus on Hsu-Pai Tseng (1949-1994). Taipei:*Journal of Academia Historica*, 39,117-157.]
- 陆铿(1997).《陆铿回忆与忏悔录》.台北:时报文化出版有限公司.
- [Lu, Keng(1997). *Lu keng' s memories and confession*. Taipei:Times Culture Publishing Co.,

Ltd.]

罗伯特·默顿(2006).《社会理论与社会结构》(唐少杰,齐心等译).上海: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原著出版于1957年)

[Merton, R.(2006). *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structure*(Trans.). Shanghai:Phoenix Publication Media Group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57).]

马星野(1935).蒋介石先生会见记.《国闻周报》,12(6),1-3.

[Ma, Xingye(1935). Script about meeting with Chiang kai - shek , *Guowenzhoubao*,12(6),1-3.]

马星野(1951).马星野自述.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馆藏马星野档案,档案号099-01-01-001.

[Ma, Xingye(1951).Ma Xingye' s Own Account. In *Ma Xingye Archives*. Taipei: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马星野(1977).《怀公展先生》.载《潘公展先生纪念集》.台北:潘公展新闻奖学金管理会.

[Ma, Xingye(1977).Missing Mr. Pan Gongzhan. In *An Anthology In Memory of Pan Gongzhan*. Taipei:Managing Committee of Pan Gongzhan Journalism scholarship]

马星野(1982).董显光与美苏里新闻学院.传记文学(台北),42(2),79-80.

[Ma, Xingye(1982).Dong xianguang and school of journalism of Missouri.*Biographical Literature*, 42(2),79-80.]

马之骥(1986).《新闻界三老兵》.台北:经世书局.

[Ma, Zhisu(1986). *Three veterans of the press*. Taipei: Jingshi Publishing House.]

乔志高(1984年4月19日).马星野在密苏里.中国时报,3.

[Qiao, Zhigao(Apr.19,1984). Ma xingye in Missouri. *China Times*,3.]

秋宗鼎(1996).蒋介石的侍从室纪实.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中华文史资料文库第8卷》.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

[Qiu, Zongding(1996). Record of attendants of Chiang kai - shek . Committee of cultural and historical data of CPPCC(ed.).*The historical data library Vol.8*, Beijing: The Chinese literature press.]

陶百川(1979).关于重庆中央日报一篇社论问题的更正与补充.《传记文学》,38(1),30-31.

[Tao, Baichuan(1979). Correction and supplement about an editorial of Central Daily News in Chongqing. *Biographical Literature*,38(1),30-31.]

陶希圣(1964).《潮流与点滴》.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

[Tao, Xisheng(1964). *Trend and drop*. Taipei:Biographical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陶希圣(1965).记陈布雷先生.传记文学(台北),4(6),10-11.

[Tao, Xisheng (1965). Mr. Chen bulei. *Biographical Literature*, 4(6),10-11.]

王世杰(2012).《王世杰日记》.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Wang, Shijie(2012).*Wang shijie' s diary*. Taipei: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of Central Academy.]

王正元(1993).为蒋介石专线接话十二年(下).传记文学(台北),62(4),79-88.

[Wang, Zhengyuan(2003). Answering the call of special line for Chiang kai - shek. *Biographical Literature*, 62(4),79-88.]

薛心镕(2003).《编辑台上:三十年代以来新闻工作剪影》.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Xue, Xinrong (2003). *Editing desk:Outline of journalism since the 30s*. Taipei:Lianjing Publishing Co., Ltd.]

叶公超(1982).怀念董显光先生.传记文学,42(2),39-40.

[Ye, Gongchao(1982).In memory for Mr. Dong Xianguang. *Biographical Literature*, 42(2),39-40.]

翊勋(1955).《蒋党真相》.北京:三联书店.

[Yi Yun(1955). *Inside Details of Chiang kai - shek Gangs* .Beijing:The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Ltd.]

曾虚白(1988).《曾虚白自传》(上册).台北:联经出版公司.

[Zeng, Xubai(1988). *Autobiography of Zeng xubai(Vol.1)*.Taipei:Lianjing Publishing House.]

张瑞德(2005).遥制——蒋介石手令研究.近代史研究,(5),27-49.

[Zhang, Ruide(2005). Distance regime : The personal order research of Chiang kai - shek . *Modern History Studies*, (5),27-49.]

周策纵(1999).《五四运动史》(陈永明等译).长沙:岳麓书社.

[Zhou, Zongce (1999). *The history of the May 4th Movement(Trans.)*. Changsha:Yuelu Publishing House.]

Kahn, R. L., Wolfe, D. M., Quinn, R. P., Snoek, J. D., & Rosenthal, R. A. (1964). *Organizational stress: Studies in role conflict and ambiguity*. New York: John Wiley.

Tong,H. (1948). *China and the world press*. Nanjing: Henry Ford Estate Collection.

Tong,H. (1950). *Dateline China:the beginning of China's press relations with the world*. New York:Rockport Press.

更正

本刊2015年第7期牛静《建构全球媒体伦理:可实现的愿景抑或乌托邦?》一文中的作者简介,误将作者牛静,打印为“牛文静”。特此更正。并向作者和读者致歉。

本刊编辑部